

## 第 1 章

# 六经责我开生面

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思想大家，梁启超尊之为清初四大儒之一。夫之既是一位充满爱国热忱的志士，又是一位有着强烈文化关切和文化抱负的哲人，他一生以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自期自许，为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，做出了许多历史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贡献，尤其是在古代哲学领域，夫之的努力开创了新纪元。

## 第一节 生平

夫之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杰出思想家，其生平与遭遇在其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，故了解其生平背景，将有助于理解其学术观点。

## 一、家世与家学

王夫之，湖南衡阳人，名夫之，字而农，别号姜斋、一瓢道人等，晚年隐居石船山，故又称船山先生；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（公元 1617 年），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（公元 1692 年）享年七十五岁。据家谱记载，夫之的祖先是太原人，后迁入江苏高邮。先辈中还出了一位跟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，这就是十一世祖王仲一，他“以功授千户”（王之春：《王夫之年谱》），后就在山东任职。其子王成又因随燕王朱棣南下立功，“升衡州卫指挥同知，遂籍于衡阳。”（同上）夫之祖辈为明王朝立过汗马功劳，王氏家族与明朝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，这一点对后来夫之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。

夫之先辈多为行伍出身，直到高祖王宁才弃武从文。曾祖王雍，“以文名著南楚”（《姜斋文集》，卷十）；祖父王惟敬，虽无甚文名，不过为人慷慨，口碑甚好。他教子严厉，期望也很大，他分别给两子取名朝聘和延聘，希望他们金榜题名而成为国家的栋梁。不幸的是，两人功名均未成就。两聘中朝聘是夫之的父亲。他崇尚程朱理学，常游武夷山以寄景仰，人称“武夷先生”。他一生虽未能中举，但学问精博，尤重践行，拒斥佛老与心学。夫之后来回忆说，“（先君）早问道于邹泗山先生，以真知实践为学”，“当万历中季，新学浸淫天下，割裂圣经，依傍释氏，附会良知之说，先君子独根极理要，宗濂洛正传”（《姜斋文集》，卷二）。对于佛老，朝聘老先生更是坚决摈斥，“先君终身未曾向浮屠、老子像前施一揖”。（王子春：《王夫之年谱》）父亲这一学术倾向，想必对夫之痛斥佛老“创生”与“寂灭”说，对其重见闻、先行后知等见解有不少影响，因为朝聘落榜后，就隐居一心教育子女，夫之耳濡目染父亲的教诲，心中不能不留下痕迹。叔父王延聘，长

于文学诗词和史学，夫之从其受益很多；大哥王介之，长于夫之十三岁，他终生致力于经学，著有《周易本传质》以及《春秋四传质》等书。王家极重礼义，祖父去世四十多年了，夫之父亲每次扫墓都甚为肃穆，如“新丧”一样，极具哀容，哭得象个泪人。这对夫之的影响很大，夫之病逝前几小时还“衣冠谒祖”。夫之在学术上注重礼教秩序，恐怕也与家庭重礼的门风有关。

书香门第与明朝功臣的家世背景，使夫之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其忠君观念的熏陶，在立身处世和治学为文两方面，夫之从家庭那儿接受了最初的启蒙，这也为其日后的发展准备了基础。

## 二、天崩地解

夫之生当明末清初，正处明朝衰亡，清朝兴盛之际，时人多称之为天崩地解。明朝后期，随着封建王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暴虐，王亲贵族“横行州府，嬉戏之间恒杀人。其平居夺人田宅，掠人妇女，不可胜数，小民不敢有一言，有司闻之亦不敢问”。（郑廉：《豫变纪略》，卷二）在此情形下，人民的不满和仇恨亦日渐强烈，用明学者吕坤的话说是：“民心如实炮，捻一点而烈焰震天；国势如溃瓜，手一动而流液满地。”（《去伪斋文集》）晚明的国势，真可谓是内忧外患，危之又危。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（公元 1448 年）至明武宗正德十三年（公元 1518 年）的七十余年间，就先后发生了十多次农民起义。万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后没多久，天启年间又爆发了导致明朝灭亡的王二、李自成农民大起义。统治者虽想尽剿、抚两策，却未能扑灭起义的烈火，相反，起义的队伍却越来越大，最后还成立了建都于西安的“大顺国”（公元 1644 年），控制了西南西北大片地域。而另一威胁则来自北方的后金。其首领努尔哈赤小时曾被明朝名将李成梁抚养，还被封为建州左

都督。他在万历四十四年（公元 1616 年）建立“后金”，势力日益膨胀，并趁明朝的腐败不断南下侵扰。在万历四十六年，他借口报“七大恨”而大举侵略抚顺，烧杀抢掠。公元 1636 年皇太极称帝，改国号为“清”，其称霸中原的野心也日益强烈。明天启七年（公元 1627 年）和崇祯二年（公元 1629 年），他先后出兵攻至北京，并于崇祯十一年大举进关，连下山东、河北七十余城，京师震动。

大明王朝在此内忧外患的夹击下，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1644 年 3 月李自成攻进北京，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，明王朝也随着结束；同年 5 月，清军打败李自成再占北京，此后清军经过十余年的残酷征服，至康熙时，逐渐统一了中国，历史在血雨腥风中终于完成了由明入清的改朝换代。对此历史变革，时人称之为“天崩地解”。

### 三、坎坷的经历

夫之一生正处于此天崩地解、风云激荡之际。“故国天崩”的惨祸，破灭了夫之的功名希望，也逼使夫之奋起反抗，而历史的现实走势则决定了夫之只得“忍死穷山”，过着动荡不安、贫困孤寂的日子。夫之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：

第一是求学和博取功名。时间大约是公元 1619 年到公元 1644 年。夫之七岁读完《十三经》，十四岁考中秀才，还曾到衡阳县学深造，成绩名列前茅；十五岁、十八岁时夫之与其兄两次赴武昌应乡试，可惜均未中。夫之十九岁结婚，次年岳麓书院读书；二十一岁时（公元 1639 年），夫之兄弟第三次赴武昌应试，依然失败。此时国势日危，落第后夫之与友人组织“匡社”，寄意于济世救民。崇祯十五年（公元 1642 年），夫之兄弟第四次赴南昌

应乡试，两人同时中举，夫之为第五名。其文章深得湖广提学高世泰的赏识，赞之为“忠肝义胆，情见乎辞”。正当他们兄弟两人踌躇满志，准备来年赴京会试时，由于时局变化，考试不仅延期，而且也根本不可能了。夫之兄弟拼搏四次，终于迈出了走向金榜题名的决定性的一步，眼看就要成功而光宗耀祖，并可一展济世救民的抱负了；不料横祸顿生，这对夫之的打击很大。夫之父亲一生七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。夫之三岁那年，父亲都五十多岁了，好不容易以副榜的身分到武昌参加乡试，正考官都同意录取他了，而副考官却以其考卷中没有避自己名之讳而不同意，最后仍然屈居副榜，到老也未能实现由进士而做官的正途，只挣得个“正八品”的空衔。夫之本想一雪父亲之耻，一显家族的光荣，可叹世运不济，梦想化为泡影。不难想象在此国破家恨的双重苦难下，夫之的心情该是多么悲愤！他的《章灵赋》一文就流露了这一心绪：“甲申春，李自成陷京师，思庙自靖，五行汨灾，横流滔天，祸婴君上，普天无兴勤王之师者；草野哀痛，悲长夜不复旦也。”（《姜斋文集》卷八）

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夫之坚拒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邀请合作的事。原来张攻入衡阳后，闻知夫之的名声，就想邀他参加起义队伍。为达目的，还以他父亲做人质，逼夫之就范。夫之虽痛恨满清，但也不愿与张氏合作，于是故意把自己的脸和手割破，叫人抬到张氏那里，以示不堪任用了。张氏见此也就放了夫之父子。事后夫之写了一首《九砺》诗，抒发对农民起义的仇恨。这其实也不难理解，因为在夫之看来，大明的灭亡，其梦想的破灭也由于农民的造反。夫之后来在理论上强调忠君与社会秩序，强调夷夏大防，并非空谷来风，自有其自身的特殊内心感受。正是带着这一感受，夫之结束了他的功名梦。

第二个时期是抗清与抗清失败后的流离播迁。时间大约是公

元 1644 年至 1668 年。在此期间里，夫之一面积极参加抗清斗争，一面四处避难。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攻入衡州后，夫之就开始了逃亡生活，并和好友夏汝弼一齐在南岳修筑了“续梦庵”，以寄亡国之思。公元 1648 年，是年夫之三十岁。他与挚友管嗣裘等人举行衡山起义，不幸失败，管氏一家全遭杀戮。夫之亡命南下，投奔肇庆的永历政权；次年他又赴桂林，结识了方以智。公元 1650 年，夫之受瞿式耜的推荐，至梧州任永历政权的“行人司行人”，这可以说是夫之一生中最高也最正式的官衔了。后因政见不合，也因遭受排挤，夫之弃职东归。为躲避清军的迫害，夫之隐姓埋名，藏匿于荒野窑洞之中，还自称瑶人。在此期间他失去了原配夫人陶氏、继室郑氏、哥哥王参之和父亲以及其他许多亲友。这是夫之一生中抛洒血泪最多的时期。其子王敌这样描述夫之此段生活：“自此随地托迹，或在梧，或在郴，或在耒，或在晋宁，或在涟邵，所寓之处，人士俱极依慕。府君不久留，辄辞去。”（《姜斋公行述》，载王子春《王夫之年谱》）其实，即使在定居“观生居”后（公元 1669 年，五十一岁），因为拒绝给吴三桂写“登基”的“劝进表”，夫之又被迫逃入深山。时年夫之已六十岁了。

逃难是夫之一生中最为悲惨的一页。长途跋涉的困顿且不说，还常常受到土匪和清军的威胁。顺治二年（公元 1649 年），夫之从桂林赶回衡阳看望病危的母亲，在衡阳附近的“陋园”就遭到歹人袭击，财物被劫掠一空。夫之所处的湘南，既有南明王朝与清军的对抗，也有农民起义军与南明朝、与清军的战斗，因而斗争尤为酷烈，《王夫之年谱》就曾如此记载道：“甲申岁（公元 1644 年），以寇退，遗骸满野，（夫之父亲）募僧拾而瘞之。”国难与战乱给夫之带来的磨难，使其既对侵略者充满仇恨，也使他深感社会安宁与秩序之重要。这一点对其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，可以说夫之在战乱中所蒙受的痛苦和辛酸是常人

以想象的。不过令人感慨不已的是，夫之从未泯灭扶长中夏的宏愿。夫之好友方以智，为示不与清人合作，也为复明无望，遁入空门，他劝夫之也“逃禅”，夫之坚决谢绝了。这既显示了夫之的入世精神，也透现了夫之抗争到底的决心。

第三个时期是隐居著述，大约是从 1669 年到 1692 年。康熙八年（公元 1669 年）夫之迁居船山，筑“观生居”，开始了相对稳定的隐居著述生涯。船山的地理环境十分贫清，夫之有这样的描写：“船山，山之岭有石如船，顽石也，而以之名。……其冈童，其溪竭，其斫有之木不给于荣，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，其田纵横相错而陇首不立，其沼凝浊以渟而屡竭……其良禽过而不栖，其内趾之狩者，与人肩摩而不忌。”（《姜斋文集，卷四）正因这儿甚为偏僻，夫之遂有久居之意，“遂以地之僻而久藏焉。”（王敌《姜斋公行述》）夫之为其土室撰了一副对联：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。”它表现了夫之终身不出仕异朝，潜心治学，发扬道统的心愿。政治形势的险恶，加之山野的荒凉和生活的窘迫，夫之仍然是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读书治学的，常常是“贫无书籍纸笔，多假之故人门生。”（同上）晚年更是贫病交加；但即便如此，夫之仍然著述不已，就此其子有生动的记叙：“自潜修以来，启瓮牖，秉孤灯，读十三经、廿一史及张、朱遗书，玩索研究，虽饥寒交迫、生死当前而不变。迄于暮年，体羸多病，腕不胜砚，指不胜笔，犹时置墨于卧榻之旁，力疾而纂注。”（同上）

这种拼命的治学精神使夫之著作等身。据统计，夫之一生写有百余种书，八百余万字；由于战乱的原因，散失的很多，流传下来的为七十三种，四百七十余万字。在颠沛流离之中，在穷困交加之下，夫之有如此巨量论著，是多么不容易！夫之学术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，举凡经学、理学、史学、小学、佛学、诗歌文学等等，都有潜心研究，而其思考的重点则是究天人之际，“于

四书及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各有稗疏... 末年作《读通鉴论》三十卷，《宋论》十五卷，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，制作轻重之原”。（王敏《姜斋公行述》）此外夫之还旁及佛、老、庄之学，著有《老子衍》，《庄子通》，《相宗络索》等专门著作；其间夫之用力最深的当数阐释张载的哲学代表作《正蒙》。史称夫之“神契张载《正蒙》之说，演为《思问录》内、外两篇”。（《国史儒林传·王夫之传》）实际上在夫之的思想中，《张子正蒙注》是最富思辨性，也最具理论深度的的代表作。清人刘献庭评夫之“其学无所不窥，于六经皆有发明”（《广阳杂记》），甚为确当。夫之的思想与学术，堪称博大精深。

综观夫之的一生，抗清、逃亡、隐居著述是其生命样态的三部曲；如果说前两者充分显示了夫之忠贞与坚韧的人格的话，那么后者则展示了夫之生命的精华，决定了其在古代思想史上的大师地位。

## 第二节 抱刘越石之孤愤

国破家亡之际，夫之是决意投入到抗清斗争中去的，前述的夫之生平中已有这方面的事实；但可悲的是，明朝的大势所去以及抗清力量之间的矛盾，使夫之终生难了“扶长中夏”的心愿，以至其晚年在自撰的墓志铭中，写下了这样两句悲愤的铭词：“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；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。”本节我们来谈谈前一句的含意。

### 一、志在复仇的刘琨

上引“刘越石之孤愤”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。文中的“刘越

石”即晋代的刘琨（公元 271 年至 318 年），字越石，中山魏昌（今河北无极东北）人。其生活的年代，正是西北各少数民族大举南侵时期，其间尤以西羯族的石勒、匈奴刘曜为烈。西晋愍帝时刘琨任大将军，主持并、冀、幽三州的军事。西晋灭亡后，他长期坚守并州，与石勒、刘曜对抗。后因势单力薄，兵败而投奔匹日磾，终被匹氏所杀。刘琨与祖逖志同道合，都志在恢复中原，“闻鸡起舞”的成语就说的是他俩的故事。史称刘琨“志在复仇”，生前他在给朝廷的上书中，曾透露过这样的心迹：“实欲没身报国，辄死自效。要以致命寇场，尽其臣节……臣闻夷险流行，古今代有，灵厌皇德，曾未悔祸，蚊狄纵毒于神州，夷裔肆虐于上国……得聘志虏场，快意大逆，虽身膏野草，无恨黄墟。”（《晋书》，卷六十二）文中所谓“没身报国”，正显示刘氏所欲求的是为国效命于疆场，驱逐“蚊狄”于中原。只可惜刘氏壮志未酬而身先死；夫之自叹“抱刘越石之孤愤”，是否也隐喻自己壮志难酬？

## 二、报国无门

时代虽然不同，但夫之所面临的处境有一点与刘琨是一致的，即都遭受着异族的入侵，而且形势更为严峻，明朝面对的将是灭顶之灾。

国破家亡之际，夫之曾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清斗争中去，但结果却是处处碰壁，他组织领导的衡阳起义失败后，其报国之心愿屡屡受挫。清军入关后，一段时间里，抗清队伍云集两湖。但由于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湖北巡抚堵胤锡的矛盾，造成“南北不协调”的危急局面，加之何的重税与粮饷政策，弄得人心惶惶。一心救国的夫之见此局面，甚为着急。他虽然只是一介书生，但仍然主动去湘阴找当年的主考官章旷（时任湖北巡抚兼粮饷总督）进

言，“指画兵食，请调和南北（督师），以防溃变”。但章竟让夫之不必多管；本无异同，不必过虑”（潘宗洛：《船山先生传》载王之春《王夫之年谱》）夫之的一番苦心未能被理解，他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衡山起义失败后，夫之曾两次赶往永历朝廷，以期报效国家，结果都使他深深失望。因为迁往肇庆的永历政权，内部充满着勾心斗角，尤其是“吴党”（王化澄为首）与“楚党”（李元胤为首）间的倾轧更为尖锐。夫之见此，深为痛惜，他拒绝了堵胤锡推荐他任的“翰林院庶吉士”的头衔，转赴桂林。时吴党与楚党正闹得不可开交，楚党的金堡倍受吴党摧残，还被打折了一条腿。夫之闻此非常气愤，他面见大学士严起恒为金氏鸣冤，而吴党却又想法陷害严起恒，夫之为此又连续三次上书，斥责吴党。吴党的王化澄借一篇《百梅诗》，欲兴文字狱加害于夫之。夫之气得吐血，幸亏高一功的营救，永历帝准许夫之休假，夫之总算脱离祸害。返湘途经桂林时，夫之受瞿式耜礼遇，遂作诗抒其愤懑、感慨之情。其中二句是这样：“萧森天放湘累客，得倚商歌侍羽觞。”（《姜斋诗集·五十自定稿》）古代不以罪死称“累”，屈原为爱国而自沉湘水，后人称之为“湘累”。文中夫之自比于春秋楚国爱国志士屈原，既庆幸自己脱离虎口，又忧虑于爱国抱负难展。

在连连遭受挫折后，夫之致仕隐居之意渐浓。顺治九年（公元1652年），大西军李定国进攻湖南，势如破竹。11月他在衡州大破清军，击毙其元帅敬谨亲王尼堪。李进驻衡州后，慕夫之名望，邀请夫之加盟抗清队伍，夫之推辞了。次年，又有人请他去永历帝的“行在”安隆谋职，夫之又谢绝了。满腔爱国热忱的王夫之，为何不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呢？从夫之彼时所写的诗文来看，是夫之对时局的失望，具体言之即是对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失去信心。在《章灵赋·注》中他写道：“时上（永历帝）受孙可望之迎，实为所挟，既拂君臣之大义，首辅山阴严公（严起恒），以正

色立廷，不行可望之封，为可望贼杀。君见挟，相受害，此岂可托足者哉？……而可望别部大帅李定国，出粤楚，屡有克捷，兵威震耳。当斯时也，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士以藏身，欲往则不忍就窀穸之魁以受命，进退萦回，谁当为所崇事者哉？”退无净土容身，进无可寄托之主，夫之进退两难，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，看来是极为沉重的。“国忧今未释，何用慰平生”就生动显示了夫之报国无门的痛苦和焦虑。

天翻地覆之际，夫之欲与刘琨一样，为救亡图存大干一番；但夫之没有刘琨那样的机遇——刘为朝廷方面大员，且握军事大权，指挥千军万马与入侵者进行过真正的对抗；而夫之只短暂地干过一阵“行人司行人”的文官，这也就决定了夫之不可能象刘琨那样，横刀跃马，为国杀敌于战场。夫之虽然和刘氏一样充满爱国之心，和刘氏一样仇恨民族敌人，但他却无力，也无法将自己的爱和恨淋漓酣畅地表现出来；相反，却处处受挤压、受掣肘，只能隐忍苟且地四处逃难，较之刘琨，夫之不能不有“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”的浩叹吧。

### 三、长歌当哭

清军入关，尤其是在向江南的大举进犯中，大肆屠杀抗清军民。其间令人发指的有扬州屠城十日，八十万人被杀戮；其后又有江阴屠城，十七万人被杀。这种大规模的屠杀，夫之不能不有所耳闻。其实夫之身边也布满了刀光剑影的血腥，他好几位亲人死于战乱，侄儿王敕就被清兵所杀；一道参加衡山起义的好友管嗣裘一家也全部遇难；夫之所景仰的抗清英雄、如瞿式耜等人都在斗争中英勇就义；至于在战难的困顿中死于非命的友人，就更多了。故夫之一生中，哭亡亲、哭亡友之诗尤多：方以智抑郁病

死，夫之“狂哭”不已，并作《哭方诗》二首。夫之晚年仿杜甫《八哀诗》作《广哀诗》十九首，以寄托哀思。

夫之不仅哭亲友，也哭崇祯，哭拼命挣扎的南明小王朝。1644年，夫之在听说崇祯皇帝自缢后，痛苦得几天茶饭不思，写下了《悲愤诗》一百韵，自吟自泣。1645年，南京陷落，福王投降，夫之闻此又作《续悲愤诗》一百韵。顺治三年（公元1646年），唐王朱聿在福建汀州被俘，旋被处死，夫之闻讯又作《再续悲愤诗》一百韵。桂王朱由榔被吴三桂抓住后在昆明被绞杀，夫之曾效命于永历朝，与桂王有直接的君臣关系，桂王也是明朝存在的最后希望。故夫之听说此噩耗，悲痛万分，于是作《三续悲愤诗》一百韵。可惜的是，他四次写的悲愤诗，均已亡佚；但从此不难看出，夫之长歌当哭，对国家危难的悲愤不已。

夫之固然对明亡的现实哀恸不已，不过，夫之爱国的立场并未飘移。他在明亡后，一直自称“南岳遗民”，“亡国孤臣”，“先朝未死人”等等，在自己的墓碑上他也要求刻上“明遗臣”的字样。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夫之对故国身份的怀念，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夫之对祖国的忠诚。事实也证明夫之终生不仕清朝，临终前还手书《惜余鬢》赠学生唐端笏。“鬢”字作黑发解，它实际上也是华夏民族的一种形体标志，在“留头不留发”的清朝，夫之写此文的反抗之意是不言而喻的。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，后来又起兵反清，在其起事的檄文中，他佯称崇祯帝的三太子还活着，正在他军中。夫之听说后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写于康熙十四年（公元1755年）的《三月七日有闻》一诗中就有这样的描写：“天涯帝子知谁在，今日生闻喜欲狂”。其间的“欲狂”两字，就鲜明表达了夫之对故国故君的向往之情。凡此种种均表明，夫之在国破家亡的“悲恸穷愁”之中，依然对故园眷恋深深，依然对中夏之复兴怀有极大的希望。正因此，夫之著作中留有许多不为新王朝

所容许的内容，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乾隆帝（乾隆三十八年，公元1773年）开四库全书馆时，还将下列夫之文字列为禁书：《船山自定稿》，《夕堂永日绪论》，《夕堂戏墨》，《五言近体》，《七言近体》等。

长夜漫漫，痛定思痛，夫之可能更深深地自责和内疚：自己未能挽狂澜于既倒，而眼看着同胞惨遭涂炭，美丽山河横被蹂躏。如果在此意义上来理解夫之“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”，则更可想见夫之暮年在回忆平生时所涌起的痛楚，又是何等刻骨！而这恰又反衬出夫之爱国之情又是何等真挚！“事何归？归何叹？明星烂，晨鸡喧，抱孤心，临万端。”（《夜坐吟》，载《姜斋六十自定稿》）大势已去，夫之孤愤难已。

### 第三节 希张横渠之正学

标题所示是夫之为自己预撰的墓志铭中的另一句话。上面说过，全文是“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”。如果说“抱刘越石之孤愤”显示了夫之政治抱负的话，“希张横渠之正学”则表现了夫之的学术追求和文化关怀。

#### 一、为天地立心的张载

夫之为何把自己的学术追求目标设定在张载身上呢？这缘在张载其人其学的特殊禀赋，故有必要先来看看张氏的生平学问。张载（公元1020年——1077年）北宋著名哲学家，“关学”的代表人物。字子厚，陕西郿县（今陕西眉县）横渠镇人，人称“横渠先生”。据明代冯从吾的《关学编》载，张载“为人志气不群，少孤自立，无所不学，喜谈兵，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”。后受范仲淹

的提拔，弃武从文。有一时期出入佛老，“尽其说，知无所得，反而求之六经”。（《关学编》，卷一）经此一番折腾后，张氏于嘉祐二年（公元 1057 年）考中进士。后曾任云岩县令，熙宁初，又迁著作郎。受御史中丞吕公望的推荐，宋神宗召见了张载。皇上问他为政为道，张载答以“法三代”。史称宋神宗很高兴，任张为崇文院校书（《宋史》，卷四二七“道学传”）。不久称疾辞职。熙宁九年，吕大防又荐引他，于是张载再赴任“同知太常礼院”。因与礼官言礼不合，又辞归故里，不幸途中染疾，死于临潼，享年五十八岁。

张载一生自甘清贫。他寄居的横渠镇“至僻陋”，当时他仅有“田数百亩供岁计，人不堪其忧，先生约而能足，处之裕如。”（《关学编》，卷一）这不禁令人想起夫之隐栖船山时的情形。张载死时“贫无以敛，门人共买棺，奉其丧还”（同上）。生活贫困未能阻止张载勤奋治学，冯从吾描述说：“终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简编。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有妙契，虽中夜必取烛疾书。”（同上）其学的主要旨趣时人以为是“以《易》为宗，以《中庸》为体，以《礼》为的，以孔孟为法”。（同上）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，张载不仅是一位理学大师，更是一位元气本体论的重要代表人物。他的“太虚即气”论，他对佛、老虚无论的批驳，把古代朴素唯物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张载留下的主要哲学著作有《正蒙》，《张子语类》，《近思录拾遗》，《经学理窟》等。

张载不仅在理论上阐述六经微言大义，也努力在实践中推行“孔孟之法”。他任云岩县令时，就极重礼教，史称“相复古者甚众，关中风俗为之大变。”（《关学编》，卷一）也正因此，吕大临在举荐他说：“张载之学，善发圣人之遗意，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，宜还旧职，访以治体。”（同上）张载自己也极有以学裕天下的雄心壮志，他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

万世开太平”（《近思录拾遗》），就充分显示了其济世救民的远大历史抱负。

张载的学术思想，在当时和以后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。如稍后的二程就非常赞赏张载的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的泛爱主张，夸之为“孟子之后，盖未之见”。（《宋史》，卷四二七）对于张载“气质之性”和“天命之性”的说法，朱熹也赞扬为“有功於圣门，有补于后学”。当时崇拜他的青年学子很多，在关中一带他更是被视为偶像，史称“为关中士人宗师……门人私谥曰诚明”（《关学编》，卷一）。鉴于张载的学术影响和文化地位，宋理宗淳祐元年（公元 1241 年）封之为“郾伯”，谥“明公”，还“从祀孔子庙庭”（同上），享有极为崇高的精神地位。可见，张载身后不仅享尽哀荣，而且也被公认为孔孟道统的经典传人。这一点恐怕也是夫之“希横渠之正学”的直接原因吧。

## 二、功不下孟子

夫之非常崇敬张载，这不仅从其“希张横渠之正学”中可以看出，更可从其下面这段话中见出这一点。他说：“呜呼！孟子之功不在禹下，张子之功，又岂非疏洙水之歧流，引万派而归墟，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。”（《张子正蒙注·序论》）这里，夫之显然是主张张载之功可媲美于孟子的。众所周知，孟子在中国古代是“亚圣”，其地位仅次于孔子，说张载之功可与孟子比肩，足见在夫之心目中张载所享有的极为崇高的地位。

那么，夫之为何说张载之功不下孟子呢？从夫之的论述来看，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。

其一是张载继承了“孔孟之道”。在夫之看来，战国之时虽有扬、墨异端，但其势力尚不足以动摇和淆乱孔孟正统，“儒者犹不

屑曲吾道以讥其邪，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”。（《张子正蒙注·序论》）后世的情形则大不相同了，夫之于此说：“自汉、魏以降，儒者无所不淫。”（同上）文中的“无所不淫”一指儒者沉浸于佛，“陷于佛者，如李翱、张九成之流，而富郑公、赵清献虽贤而不免，若陆子静及近世王伯安，则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，说愈淫矣。”（《张子正蒙注》，卷一）二指儒者忘情于老子道学：“陷于老者，如王弼注《易》及何晏、夏侯湛皆其流也，若王安石、吕惠卿及近世王畿、李贽之属，则又合佛、老以溷圣道，尤其淫而无纪者也。”（同上）三指以邵康节为代表的象数学的神秘主义。夫之说，在当时邵氏之说的影响甚大，以至张载之论“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”。（《张子正蒙注·序论》）总之汉魏以后的学术形势，在夫之看来是大为不妙的：异端崛起，孔孟儒学几有花果飘零之势，夫之形容之为“苟不抉其跃如之藏，则志之摇摇者，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”。（同上）其间虽有宋儒出来力挽狂澜，但收效甚微，夫之说：“学之兴于宋也，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……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，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，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熿，其以朱子格物、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，犹水之胜火，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。”（同上）这是说宋初诸大儒并未维护好孔孟之学，并未彻底战胜异端邪说。夫之还特别提及，大儒朱熹对经典的态度是有严重问题的，“自朱子虑学者之鹜远而忘迩，测微而遗显，其教门人也，以《易》为占之书而不使之学，盖亦矫枉之过。几令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继天立极、扶正人心之大法，下同京房、管辂、郭璞、贾耽壬遁奇禽小技”。（同上）在此正、邪相争的胶着状态，夫之认为是张载打破了僵局，扶正压邪，恢复了孔孟之学的真谛和权威；朱子轻《易》，“而张子言无非《易》，立天，立地，立人，反经研几，精义存神，以纲维三才，贞生而安死，则往圣之传，非张子其孰与归”！（同上）故

夫之感叹：“呜呼！张子之学，上承孔、孟之志，下救来兹之失，如皎日丽天，无幽不烛，圣人复起，未有能易焉者也。”（《张子正蒙注·序论》）

其二是张子恢复了“性命之正”，亦即确证了正确的天之道与人之道。夫之以为古代的人既朴实又明于人伦物理，他说：“抑古之为士者，秀而未离乎其朴，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禄之科，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；其尤正者，无狂思陋测，荡天理，蔑彝伦而自矜独悟，如老聃、浮屠之邪说，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，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，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。”（同上）到了东周则出现了“邪慝”，幸赖孔子“赞《易》而阐形而上之道，以显诸仁而藏诸用”，又幸赖孟子“推生物一本之理，以极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所由生。”（同上）如上所述，夫之认为汉代以后，异端邪说勃兴，致使人们思想混乱而“志摇摇”，其间的关键在夫之看来就是“中道不立”，以至“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，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！”（同上）程朱虽竭力拨乱反正，但前已提及，他们并不成功，只有张载才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：“程子规模直尔广大，到魁柄处，自不如横渠之正。横渠早年尽佛老之藏，识破后更无丝毫黏染。一诚之理，壁立万仞。故其门人虽或失之近小，而终不失矩短矧。程子知得后却落入空旷去。一传之后，遂有淫于佛老者，皆此等启之也。”（《读四书大全说》，卷十）张子之所以能如此，夫之前面已说过，因为张子之学立天、地、人之极，得往圣先贤的真髓。

正因为张载的思想既继承了孔孟之志，又得“性命之正”，所以夫之深信如果大力宣扬张载的思想，使天下人都明白张子之学，那么异端邪说就难以滋生和泛滥。他说：“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，以正童蒙之志于始，则浮屠生死之狂惑，不折而自摧，陆子静、王伯安之蕞然者，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，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